

明清晋商万里茶路扩展动力分析

——基于经济地理学的视角

孙海龙¹, 孙云^{1*}, 苏峰², 潘一斌¹

(1.福建农林大学 园艺学院, 福建 福州 350002; 2.福建省种植业技术推广总站, 福建 福州 350003)

摘要:基于经济地理学的视角,从人口与土地配置失衡、区内城镇与市场的梯度差异、政策与政局的变化波动和区际产业与资本的互补四个方面,对明清晋商万里茶路的扩展动力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万里茶路是集信息、资金、产业和技术等生产要素为一体的密集经济轴带,是晋商在占主导的内核动力和起催化的外部动力复合叠加作用下累进式打造的跨区域产物。

关键词:晋商;万里茶路;扩展动力;经济地理;明清

中图分类号: F319.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2013(2013)01-0068-05

Extended power of Shanxi merchants' Wan li tea road's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nomic geography

SUN Hai-long¹, SUN Yun¹, SU Feng², PAN Yi-bin¹

(1.Horticulture Institute, Fujian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 Fuzhou 350002, China;

2.Fujian Provincial Planting Industry Technology Extension Center, Fuzhou 350003,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economic geography, the extended motivation of Wan li tea road of Shanxi merchants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was studied and analyzed from four aspects, which included the imbalanced facility of population and lands, the gradient of towns and market, the fluctuation and change of policy and political circumstances, the complementarity of interregional industry and capital. The study concluded that Wan li tea road was an intensive economic axial belt integrating factors of production, such as information, capital, industry and technology, and it was also a cross-regional product created by both the ruling inner motivation from Shanxi merchants and the catalytic external motivation.

Key words: Shanxi merchants; Wan li tea road; extended power; economic geography;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万里茶路是指明清时期尤其是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后由晋商开辟的一条将江南茶叶通过船运、车载和驼运方式销往新疆、中亚和蒙俄等主要市场的复合经济轴带。全程主干道总长 4 980.96 公里,分为三段:南段从福建崇安(今武夷山市)到河南赊旗主要为船运;中段从河南赊旗至河北张家口主要为车载;北段从张家口

到恰克图是驼运。^{[1]86-88}明清时期,作为集资金流、人口流、产业流和财富流于一体的万里茶路,是因茶而设、因茶贸兴衰而变迁的国际茶业专道和南北经济大动脉,对推动江南茶业发展、活跃全国商品经济和中西方茶叶贸易发挥了重要作用。学界关于晋商万里茶路的关注始于近十年,研究成果依据研究视角与内容基本分为四类:一类是专门研究万里茶路演变史的文章^[2-7];二类是从商史角度出发,运用历史学和金融学方法,主要探析晋商商贾或票号的兴衰过程,少部分涉及或侧面提到万里茶路路线^[8-10];三类是从晋商经商文化(即经营理念和伦理价值)出发,挖掘山西传统黄土文化对晋商万里茶路的

收稿日期: 2011 - 11 - 30

基金项目:福建省现代农业(茶叶)产业技术体系项目(2009 - 2013)(2060302 闽财指[2012]0516 号)

作者简介:孙海龙(1986—),男,山西省兴县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茶叶经济与文化研究;*为通讯作者。

深刻影响^[11-12]；四类是为促进地方旅游业发展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而挖掘整理的有关万里茶路文章^[13-14]。以上成果的研究视角主要集中于史学、经济学和文学，一些成果散见于晋商研究的相关史料评述章节中，且绝大多数都是侧面概述茶路兴衰过程，缺乏多学科交叉性地对万里茶路扩展动力的系统研究。

鉴于此，笔者拟在以上研究基础上，基于经济地理学的视角，从人口与土地失衡性配置、区内城镇与市场的梯度差异、政策与政局的变化波动和区际产业与资本的互补四个方面对明清晋商万里茶路的扩展动力进行系统探究，进而逻辑梳理出其扩展机理，以期揭示晋商茶贸规律并为再续中国茶业辉煌提供启示借鉴。

一、人口与土地配置失衡

区域经济发展是区域人地系统中各要素不断协调与整合的过程。其中人口和土地的配置是该系统的内在核心因子，直接关系着区域产业发展载体的交通设施在空间的布局与变迁，进而影响着区域比较优势和增长极效应的发挥。^[15]万里茶路作为特定时空下人地系统中人口和土地不均衡配置的产物，其形成与扩展的阶段、层次和速度均受到明清时期山西省内人口和土地配置关系的统摄。人口与土地配置失衡为晋商开拓万里茶路提供了早期的内部动力。

明代，山西人多地少矛盾凸出，叠加生态破坏、干旱等天灾，出现大批商业移民。明代前中期，山西人口与邻省(除山东外)相比密度最高。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至万历六年(1578年)的185年间，人口增加约124.72多万人，人均土地减至6.92亩，人均土地减少32.68%，低于全国的10.80亩/人，更低于周边三省(陕西、山东和河南)平均水平的10.56亩/人^[16]；由于人口增加与土地贫瘠，森林和草地滥垦现象严重，导致生态急剧恶化(水土流失，沙漠向南侵移，旱灾频次加大且持续时间变长)，土地生产力日趋降低，山西人地关系形成一种恶性循环^[17]；再加上省内人口分布极不均衡，人口高度密集区主要分布在传统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最发达的中

部狭长汾河谷地内，自南向北依次为平阳府中南部(以蒲州、安邑、绛州、临汾、洪洞、霍州和灵石最发达)、汾州府中部(以介休、汾阳和平遥最发达)和太原府中南部(以祁县、太谷、榆次和阳曲最发达)，人地矛盾压力空前加大，土不能养民，致使大批生存性移民频繁出现。据《明史》和《明实录》记载，明初洪武年间山西移民10次，永乐年间移民8次，共计18次，每次移民少则七八十万人，多则百万人^[18]，迁往地以人口密度较小的省内北部边界和周边省份为主。在山西大批向外生存性移民中，大部分缺少甚至没有田地，客观上只好被迫弃农从商，为日后晋商开拓万里茶路奠定了早期经商经验和原始资本积累。同时，也在地缘上积累了原始的茶贸情报。

清朝人地压力在明朝基础上整体继续增大。清初，由于受明初移民政策和明末清初混乱战局的叠加影响，山西人口大幅锐减。其后，随着“一条鞭法”、“摊丁入亩”、屯垦政策力度的加大以及减免关税、市税等赋税制度的改革，人口数量从康熙中期至光绪三年(1877年)迅速攀升至顶峰，达到1643万人。与此同时，耕地的增长率与人口增长率不同步且低于人口增长速度，差距越来越拉大。从顺治十八年(1661年)至嘉庆十七年(1812年)，人口从628万人上升到1400万人，增长率为123.04%；田地由4078.7万亩增加到5528万亩，增长率为35.53%；人均田地由6.5亩/人降到3.95亩/人，下降率为39.23%。^[19]这样，传统农业经济的抗压弹性远不足以缓解区内人口和土地失衡性配置导致的激增性人地压力，致使人地矛盾的潜在危机加速趋向空前激化，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就异常松散。另外，在富裕茶商实际受到社会尊重和地位提升下，出现“学而优则商”、“生子有才可做商，不羨七品空堂皇”、“当官入了阁，不如茶票庄上当了客”等经商风气。于是，农民为了追逐更高收入和利润，弃田转向茶贸的动机和信念就异常迫切和强烈，从而主观上逐步支撑起了以中部狭长商道为载体的大规模长途茶贸活动，进而为清中期蜕变为国际茶商奠定了雄厚的人力和资本基础。期间，作为沟通边贸消费区和江南茶产区的万里茶路也必然在中蒙俄

茶贸需求的驱动下获得不断累积性拓展。

二、区内城镇与市场的梯度差异

城镇是区域经济发展的综合生产载体,支撑着各种生产要素、功能区和节点在地域上配置成市场,市场的类型和规模决定着区内经济发展的水平和商贸结构的类型,进而影响着区域交通系统的空间演变。城镇与市场在地域上具有高度重叠性,通常形成于能作为重点开发轴线的交通要道、具有战略意义的增长极或自然资源积聚的梯度非均衡点。明清时期,晋商境内茶贸活动主要集中于以大同为核心,右玉、左云、天镇等府卫为边缘的晋北茶贸经济圈,与境内晋中金融走廊、晋南盐—绸经济圈的商贸结构与发展水平相差较大,存在着密切的茶贸关联。

以晋北茶贸经济圈为例,此区域中心是集茶贸集散地、军事重镇和晋北核心市镇于一地的大同,以“茶马易市”为特色主导经济。随着明后期茶马交易私人化的规模化推进,晋商茶贸活动逐渐深入蒙俄市场,茶贸路线绝大部分以大同为必经中转枢纽向北、东北和西北延伸,少量从右玉杀虎口入归化至库伦。其中,向北路线(大同—张家口—乌兰察布—库伦—恰克图—俄国)是万里茶路的北段主干道,是将以福建武夷山为代表的江南茶叶输往蒙俄市场的最便捷茶路,远程茶贸运输成本和交易成本最低(以嘉庆朝为例,晋商恰克图茶叶交易的利润率为55.68%,成本利润率则为125.64%^[193]),大同“军民杂处,商贾辐轴”^[20]、“繁华富庶,不下江南”^[21]同时,以大同为区域增长中心,辐射和带动了右玉、天镇、怀仁、应县、左云等周边边贸市场的崛起,南北茶商云集。如仅大同西部的杀虎口,“自猷琛以来,汉夷贸迁,蚁聚城市,日不下五六百骑,利不下数十万”(胡广,《明神宗实录》558卷,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校印);而晋北茶贸市场资金的调剂与融通、人才队伍的组织与管理统一受晋中金融走廊(晋商家族企业总部驻地)掌控。据光绪末年有关资料统计,山西太原、汾州两府茶商已超38家,其中太原府占到近60%。太原府的平、祁、太27家票号资本总额约710万两白银,主营盐、茶、铁、典当。^{[19]40}另外,明初开中制以

来,以“盐城”运城为晋南区域中心,带动和促进了阳城(铁业)、潞安(丝绸)、霍州等(煤)晋南盐—绸经济圈一些工商业城镇的发展,为清初晋北茶贸活动奠定了雄厚的早期资本基础,同时也是万里茶路中段的必经之地。据嘉庆《介休县志·艺文》(卷十二)载:运城“城镇周五里,屋舍鳞次,不下万家,盖藏者万家,商贾复四方辐辏,俨如大邑”。

由上可知,山西境内各商贸经济圈的城镇与市场体系不仅功能各异、梯度明显,而且存在着密切的茶贸关联性。正是这种梯度依赖性和需求关联性,使得中部狭长汾河谷地不仅成为万里茶路中段的末端主干道,也是构成晋商区内大茶贸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沟通境内外茶贸经济活动的血脉或桥梁。

三、政策与政局的变化波动

政策与政局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软因子,直接对区域交通运输体系的运行机制、配置方式和效率产生影响。政府采取不同的区域政策和区域发展战略,将深刻影响到区域经济发展对交通运输的需求和布局,而内外政局的波动则对区域交通运输的发展机会和路径变迁起着催化作用。^[22]

明朝初年“开中制”、“开中折色制”、“一条鞭法”等有利的财税政策促使占尽地缘优势的晋商率先突破山西中部经济轴带,北上南下贩盐茶,垄断了晋蒙边贸市场,形成万里茶路的倒“T”字型北段雏形。明代前中期从大同东出张家口,分两支:主干茶队直接折向西北与来自归化(今呼和浩特)的驼队汇合后继续同道北上,经库伦(今乌兰巴托),抵恰克图;小股分支从张家口出发,经多伦诺尔厅(今多伦县)、锡林浩特,向西与主干大队伍在接近内蒙古边境的内侧汇合,通往恰克图^{[8]62-63}。明代后期至清代前中期,朝廷茶政松弛致使私茶贸易涌动,再叠加海禁政策导致海路受阻,特别是雍正五年(1727年)中俄签订了《恰克图条约》后,中蒙俄边境出现以茶叶为代表的大宗商贸,规模与范围空前。据统计,嘉庆六年(1801年)中俄在恰克图交易额为810万卢布,嘉庆十五年(1810年)上升为1316万卢布,1851年经恰克图输出的茶叶总额占中俄贸易总额1500万卢布的40%,茶叶一项占中

方输出总额的98%。^{[11]79}同时,带动了一大批茶贸市镇和茶区兴起,加速了万里茶路的横向扩展和纵向延伸。《崇安县志·物产篇》(民国版)载:“清初茶市本在下梅,道光咸丰年间,下梅废而赤石兴。盛时每日竹筏薄300(张),转运不绝。红茶、青茶向由山西茶客到县来采办,运往关外(恰克图)销售,一水可通,运费节省,故武夷(茶)之利,较从前不啻仅蓰。”至此,从武夷山到恰克图的主要茶贸路线沿大中市镇轴带初步形成,至咸丰三年(1853年)达到顶峰。此后三年间,太平天国西征军先后控制了武夷山茶路的咽喉部位(皖、赣和鄂东部),造成万里茶路长江以南中断,闽茶价格暴涨50%,晋商损失高达两百万两白银,茶叶采购和生产重心被迫收缩至两湖地区。^{[4]57-58}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陆续签订《天津条约》及《北京续约》、《中俄陆路通商章程》等不平等条约,对内收缴沉重的厘金税等,加上列强凭借绝对特权制定不平等贸易规则,致使晋商在内外夹击下利益空间被迅速挤尽,茶贸动力急剧弱化,万里茶路最终被迫走向解体,并趋于消亡。

总之,明清政府或决策者在内外政局波动下所采取的财税政策、政治和军事战略,深刻影响到晋商拓展万里茶路的方向、规模和速度,特别是不同时期局势对万里茶路的扩展机会和路径变迁起着诱导或催化作用。

四、区际产业和资本的互补

区域非均衡发展理论认为,在交通、信息欠发达的经济系统中,区际客观存在产业和资本的空间异质性、非均衡性和互需性,使得缩短区际时空有效距离、获取最大投资回报率成为可能。万里茶路是一个开放性的经济系统,与山西外部涉茶区域存在着产业、资本和信息的密切互动,以此不断推动着自身的空间扩展与变迁。

明清时期,晋商茶贸活动处于不完全竞争市场中,区域资本和产业的空间供求不均衡使得区际商品的价值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地区差价和季节差价。^[23]这成为晋商通过万里茶路缩短区际有效距离,谋求中介报酬最大化的重要外部驱动力。特别是中俄签订《恰克图条约》后,面对以畜牧业为特色产业

的蒙俄地区茶叶需求旺盛、茶价高涨与南方茶区资本不足、茶价低迷形成的超高区际利润局面,晋商快速组建庞大运输茶队和地域性茶帮,将主营业务由盐业转换为茶叶,充当起茶贸中介角色。据统计,从乾隆朝起俄方采购中方的茶叶资金逐渐上升。乾隆二十年(1755)为83万卢布,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猛增到135万卢布^{[8]71},到19世纪30年代末超过1600万卢布,咸丰年间高达1500万美元^{[11]68}。江南许多产茶地在北部蒙俄资本的间接驱动下,茶业逐渐兴盛繁荣,部分地区茶业成为区域主导产业,使得借助晋商中介的蒙俄畜牧业和南方茶业实现密切的跨区互补。如武夷山茶区仅瓯宁一县“每厂大者百余人,小亦数十人,千厂则万人。近来茶山蔓延愈广,县辖四乡十二里几遍、西乡在万山深处亦有茶山,兼以客贩担夫络绎,道途充塞。”(蒋衡·云寥山人文钞·卷二,禁开茶山议,咸丰元年刊本,21)此时,万里茶路系统的主干骨架(北抵恰克图南到福建崇安县下梅村)也响应着区际产业和资本跨区联系的运输需求,从而被全程打通。

咸丰三年(1853年)赣闽茶路被太平军阻断后,尽管蒙俄茶贸资本总量继续上升,但俄商由原先通过晋商中介的茶叶间接采购逐渐转变为跳过晋商直接深入江南茶区,集采购、加工和运输于一体,分化和消解着晋商茶贸业务,弱化着万里茶路的扩展动力。《刘坤一选集·奏疏》(卷一)载道:“俄商在汉口开设洋行,将红茶、砖茶装入轮船,自汉运津,由津运俄,运费省俭,所用日多,遂将山西商人生意占去三分之二。”晋商为缩短运程、节省运费和提高同俄方茶商的竞争力,一方面,将采茶基地转向湘鄂茶区(中期办茶在湖南安化,后期在湖北崇阳、蒲圻、通城和湖南临湘一带(梁绍森,庞义才.《山西外贸志》,山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84:110);另一方面,将票号的分号拓展至万里茶路的沿江重要商埠、码头及贸易中心,并且还将大部分商业资本转化为工业资本(主要是建立茶叶生产基地和加工基地),工商混合经营^{[24]132-136},服务于两湖茶区茶业发展的资本需求。在晋商茶贸资本和欧美等洋商资本的充足供给下,两湖茶业迅速崛起,并带动了汉口、湘江和长江沿线码头以及一批茶区新兴市镇的兴起和发展。《刘坤一选集·奏疏》

(卷一)记载：“湘鄂产居多、赣闽较少，向为晋省所运。”蒲圻茶为主导产业“四乡皆产之，上阜及平原地无不种茶获利”（《蒲圻乡土志》64页），汉口是晋商荟萃之地，有太原帮、汾州帮、闻喜帮等，他们经营着茶、烟、布、油、皮货等。^[27]于是，万里茶路沿着这些高速推进的茶业中转市场和新兴市镇不断变迁，直至清末英俄等洋商茶业资本取代晋商控制了两湖茶业供给，并开拓了更为高效便捷的水运和海运新茶路后，晋商茶贸中介优势完全丧失，万里茶路最终趋向消亡。“恰克图茶贸兴盛时，山西商人设有大小商号140余家，至清末只留下20余家，减少了6/7”^{[25]145}。

综上所述，万里茶路是一种客观的区域经济地理现象，是一个涉及自然与人文多维因素相互叠加形成的动态性复合巨系统，其形成与演变具有内在必然性。万里茶路是晋商的内、外动力因素共同作用于具有不同比较优势区域的综合响应结果，即晋商在区域人口和土地失衡性配置以及城镇与市场的梯度差异等内核动力主导下，叠加明清不同阶段政策与政局的变化变动和区际产业与资本的互补等外部动力的催化，并经过两者有效协调与整合，累进式打造的跨区域复合产物。

参考文献:

- [1] 石涛, 杨志芳. 清代晋商茶叶贸易定量分析-以嘉庆朝为例[J]. 北京: 清史研究, 2008(4): 86-88, 93.
- [2] 李晨光. 万里茶路探晋商[J]. 文史月刊, 2007(9): 38.
- [3] 邓九刚. 茶叶之路—欧亚兴衰三百年[M].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0.
- [4] 赵荣达. 晋商万里古茶路[M]. 太原: 山西古籍出版社, 2006: 57-58.
- [5] 艾美霞. 茶叶之路[M]. 北京: 中兴出版社、五洲传播出版社, 2007.
- [6] 程光. 晋商茶路[M]. 太原: 山西经济出版社, 2008.
- [7] 常士宣. 万里茶路话常家[M]. 太原: 山西经济出版社, 2009.
- [8] 张正明. 晋商兴衰史[M]. 太原: 山西经济出版社, 2010: 62-63, 71.
- [9] 史若民. 晋商兴衰史[M].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8: 15-18, 41-50.
- [10] 黄鉴晖. 山西票号史[M]. 太原: 山西经济出版社, 1992: 450-464.
- [11] 葛贤慧. 商路漫漫五百年—晋商与传统文化[M]. 太原: 山西经济出版社, 2009: 68, 79.
- [12] 张正明. 晋商与经营文化[M]. 北京: 世界图出版社, 1998: 197-201.
- [13] 祝笋. 茶叶之路建筑遗产的形成与保护[J]. 华中建筑, 2012(2): 23-26.
- [14] 巩志. 武夷山至恰克图茶叶之路[J]. 农业考古, 1993(2): 202-203.
- [15] 陈日新, 陈向阳. 区域增长极形成机制研究—以我国珠三角地区与香港为例[J].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 2008, 30(8): 37-38, 45.
- [16] 梁方仲. 中国历代户口、田地、天赋统计[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0: 18-19.
- [17] 史念海. 论历史时期黄土高原生态平衡的失调及其影响[J]. 沈阳: 生态学杂志, 1982(3): 21-23.
- [18] 张青. 山西洪洞大槐树[M]. 太原: 山西古籍出版社, 2004: 39.
- [19] 王尚义. 晋商商贸活动的历史地理研究[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4: 40, 59.
- [20] 刘海年. 皇明条法事类纂: 卷四十二[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94.
- [21] 谢肇淛. 五杂俎: 卷四[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 [22] 杨培峰, 甄峰, 王兴平. 区域研究与区域规划[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0(6): 77-78.
- [23] 李建生, 刘鹏生, 薛红忠. 明清晋商制度变迁研究[M].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5: 106.
- [24] 黄鉴晖. 明清山西商人研究[M]. 太原: 山西经济出版社, 2002: 132-136, 145.
- [25] 张正明, 张舒. 晋商兴衰史[M]. 太原: 山西经济出版社, 2010: 81.

责任编辑: 曾凡盛